

# 翻譯 新歷史（上）

\*傑克·萊·哥夫著  
梁其姿譯

本文譯自“*L'histoire nouvelle*” in *La Nouvelle Histoire*, J. Le Goff (ed.), Paris: Retz, 1978, pp. 210-240.

廿多年來我們經歷了一次科學界深遠的更新。不單大部份的科學都顯示了這個急劇的轉變——這已是老生常談的事了。尤有進者，知識的分門別類亦異常迅速。而對於認識論的 (épisté-mologique) 反省——認識論這個詞頗成風尚本身就是滿有意思的現象——的發展尤其深遠。這個巨變特別影響了其中一類科學，而這類科學之同被認為是科學性的東西是一個極具意義的新現象，它們就是人文科學或人的科學 (sciences de l'homme)，這是法國人的稱法，自一九五七年以來大學裏即這樣分系（文學及人文科學系）。英美系統則稱之為社會科學。這個知識新領域的出現具有三個現象：

(1) 肯定嶄新的科學和已有數十年傳統但已跨出大學的象牙塔，獲得了廣大讀者的科學，其中包括社會學、人口學、人類學（代替了民族學）、人性學 (éthologie)、環境學、記號學 (sémiologie)、未來學 (futurologie) 等。

(2) 傳統科學的問題 (problématique) 和教學的革新。這個

改變為這些科學加上一個「新」字，如新語言學、新經濟史，

最奪目的莫過於在人文科學之外的新數學。

(3) 學科之間的交流帶來了組合科學，它們的命名包括主要名詞和屬形容詞，如社會學性質的歷史 (*histoire sociologique*)，歷史性人口學 (*démographie historique*)，歷史人類學 (*anthropologie historique*)，或者乾脆是新的混合名詞，如心

理語學 (psycholinguistique)、人類史學 (éthno-histoire) 等，人文科學甚至會超出血口銅鑼與自然科學結合起來，於是產生了如社會數學 (mathématiques sociales)、心理生理學 (psychophysiology)、人類精神病學 (éthno-psychiatry)、社會生物學 (sociobiologie) 等新學科。

## 一、歷史學特有之地位

歷史學在這個新開拓的天地裏佔着特有的地位。我們有新歷史，新歷史的先聲之一昂利·卑爾 (Henri Berr) 早於一九三〇年創用這個名詞。歷史學地位之所以特別，是由於它的兩個基本特性：它是整體地翻新，但它的轉變是深植於其悠久而牢固的傳統之中。很多科學只是達到了片面的現代化，沒有全面的更新。地理學就是最先更新的人文科學其中之一，關鍵在於人文地理的發展。繼維大爾·德拉·白拉士 (Vidal de la Blache) 之後，尚·布倫斯 (Jean Brunhes)，愛爾卑·德曼雄 (A. D. e-Mangeon) 和須里·西用 (Jules Sion) 就鼓勵以人文科學、人類科學的精神去研究地理學，立場跟新歷史開始轉變時一樣。這批地理學家對新史學大師（如路西恩·費夫爾 Lucien Febvre，馬克·保洛克 Marc Bloch，費爾諾·布魯代爾 Fernand Braudel）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布魯代爾在一九四七年的高等實驗學院第六校 (VIe Section de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譯者案：即今日之高等社會科學院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的課程就是地理歷史 (*histoire géographique*)。費夫爾一向都強調新歷史與人文地理的密切關係。在懷念西用和德曼雄的悼文裏，他形容西用：「雖身為地理學家，却深諳歷史之法」。在另一篇悼念保洛克的文章中，他這樣寫着：「……如許多其他的同儕和前輩一樣，他深深地受到德拉·白拉士這位充滿魄力的天才大師所領導的地理學的影響和滋潤。」費夫爾的『土地與人之進化—歷史之地理學』(*la Terre et l'Evolution humaine, introduction géographique à l'histoire*) 一書既創了新歷史同時作時空的探索。莫利斯·龍田彌 (Maurice Lombard) 就首先用這個方法寫回教區的歷史。

因此，繪圖法在新歷史中佔很重要的地位。新歷史的確採用並繪制了不少的地圖，而且都不是簡單的說明地圖，而是用來研究解釋的地圖。地圖的採用主要是由於需要把長久持續時間 (longue durée) 刻進空間之內，地圖可以表示地區的量化資料。更者，在各相異或相似的區域內所發生的現象間的關係 (corrélation) 很可能會解釋某些東西，這類假設最宜書寫在地圖上。這是歷史對地理的質詢，為的是要擺脫任何形式的必然性 (determinisme)。保洛克在他的『法國農村歷史之特性』(*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一書中即不斷地提示歷史在改變景物和耕種方式中所擔任的角色，法國西部農地田莊以樹木行列相隔的景緻 (boisage) 並非來自土壤，而是來自人的創作。

(上) 凡新歷史都是整體歷史的嘗試

史歷新

就說過，標題用兩個形容詞，尤其「社會」一詞是由於它們的意義含糊而可以包容所有歷史：「我們知道對『社會』一詞，一向以來很多人都發表過不少意見，到頭來似乎這個詞並不特別指明甚麼了……。我們認為一個如『社會』(social)這樣曖昧的詞是歷史上蒼賜給塵世的禮物，用來標榜一份不希望在它周圍築圍的雜誌。世間上並沒有經濟史社會史，只有歷史，在其統一性內之歷史 (dans son unité)。歷史本來的意義 (par définition)就是完全是社會的 (sociale)。」

### 〔一〕新歷史擴大了歷史資料的範圍

新歷史的第二個特點就是能緊繫著它底長遠而牢固的傳統。當然，它的誕生大部份是起於對十九世紀實證主義歷史的反抗（實證史學的定義可從一九〇〇年左右出版的史學方法中看出來），但實證主義的史學方法中一些技巧却仍然被保留。保洛克就會帶點誇張地讚賞過直接地影響了十九世紀的史學和廿世紀的傳統史學的當·馬比用 (Don Mabillon) 這個淵博歷史學 (Histoire étudite) 大師：「一六八一年出版了 *De Re Diplomatica*，是人類精神歷史的真理的一個里程碑，檔案資料的批評從此建立。」新歷史擴大了歷史資料的範圍。郎格洛瓦 (Langlois)、塞諾博 (Seignobos) 的歷史主要是建立在文獻上，而新歷史却廣泛地採用不同性質的資料：各種不同的著述、文學性的資料、考古文物、口語資料等等。任何統計數字、物價曲線、照片、電影，或更遠古的化石、工具、碑銘等等都是新歷史的重要資料。但是，對這些新資料的批評總不能超越十七、十八、十九世紀以來分發展得十分成熟的方法。

今天歷史經歷了一次「資料革命」，這次革命和新歷史間

有很曖昧的關係。我往後會再談到這一點。至今我們還不會好地去闡述過資料採用與批評的新觀念。

歷史不單能利用傳統的方法，而且在學術界上佔盡優勢。很多其他的人文科學不是不能更新，便是因為太新所以很難找到自己的身份 (identité)。而以歷史為職業的學者却擁有牢固的基礎和深厚的訓練。所以雖然新歷史之精神不能滲透傳統史學界，同時智慧的鍛煉亦不廣受鼓勵（高等教育文憑鑑別試aggregation 即其中一例），但是傳統史學界已凝固成一個堅牢的制度基礎。這樣歷史才可以緊繫著它底長遠的傳統轉向新的領域而無後顧之憂。

在一九六一年著名的憂懼斯特會議上，英國民族學大師伊凡斯·布力沙德 (Evans-Pritchard) 備要求人類學家走進歷史學家的陣營，主要是由於他們對資料批評的經驗和對時間及轉變的銳覺。

主要的是把歷史從墨守成規中解脫出來。首先要打破學科的界限。在一九三二年費夫爾這樣寫道：「把古老的過時的分隔棄之於地，丟開迂濶的偏見，因循的常規，錯誤的概念和理解的銳覺。」

(426)

### 二、新歷史的誕生：「年鑑派」

*traditionnelle et la synthèse historique*)，提出了比較性研究的看法。他最敬服的昂利·皮樂亦在一九二三年四月間舉行的第五屆國際歷史科學會議中發表題目為「史學中之比較方法」的報告論文。保洛克在他的 (*「歷史底辯白或史學家的事業」*)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一書中這樣寫着：「真正的歷史只有一種，而這種歷史只能靠互相合作才能完成，這就是世界性歷史 histoire universelle。」

#### 〔一〕對政治史之反抗

『年鑑學報』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九年間要反抗的是甚麼？首先是反抗費夫爾和保洛克的眼中釘——政治史，尤其是政治外交史，愛爾·保潔亞 (Emile Bourgeois) 的那本『外交教材』就是這種歷史最可怕的典型。這類歷史一方面是述說式的，另一方面是紀事為主。即只記舞臺上表面的演出而忽略了在後臺所發生的真正歷史、隱藏着的結構、應該追尋、分析、解釋的事物。一九三一年卑爾在『綜合雜誌』*Revue de Synthèse* (譯案：即一九〇〇年創辦的『歷史綜合雜誌』) 裏發表了「歷史抑或政治？」一文，真討論剛出版的『歐洲外交史』一書，社會性的、思想性的、宗教性的和心理性的。」

十五年後，費夫爾又以同樣的調子在『年鑑學報』發表『武裝的和平（一八七一——一九一四）』的書評，其中針對書中一句：「歷史唯物論的支持者烏諾大（國際糾紛中經濟的因素

而忽略了政治和道德的因素。」他以慣常的充滿挑釁性的口吻說：「啊！老天！歷史唯物論要幹的是甚麼？……世界是世界，一九一四年大戰前的世界跟一九二〇年至四〇年的世界就不同。但其實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世界就已經異於一八四八至一八七一年的世界了。爲甚麼？是政治的因素嗎？道德的因素嗎？當然不是，是經濟的因素。這簡直太明顯了！」然而，在同一文內，他又提到保洛克的遺作『奇怪的失敗』(L'*étrange défaite*)，爲法國的戰敗作出這樣的診斷：「主要是智慧和性格的失敗。」

從這幾段引句中我們可以大概地把握到『年鑑學報』的立場和活動，它的豐富性和不足之處。它向表面化和簡單化的歷史，只述及表象和只提出一個因素的歷史提出挑戰。不過，我認爲它亦反對過份折衷(*électique*)的分析，因爲這樣會迷失在「衆多動機」之中，會混淆原因和動機。最主要的是提倡一個深入而全面的歷史，首先得打破這個貧乏的、僵化的、徒具虛假外殼的假歷史。

### (二) 對歷史事實的觀念的批評

『年鑑學報』同時對歷史事實這個觀念提出了不留餘地的批評。並沒有一個現成完整的歷史真實，會自然地呈現在史學家眼前。像所有搞科學的人一樣，歷史學家應該如保洛克所說：「面對無邊無際雜亂無章的真實」而「作他的選擇。」當然不是武斷或隨意的選擇，而是科學地建立資料，而資料的分析應能重建過去、解釋過去。費夫爾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的就任典禮中致詞時說：「被認為是歷史的原子的事實(fait)，我們往那裏求取呢？哈法伊也克(Ravaillac)刺

殺亨利四世，這是個事實嗎？如果我們要分析，把事情分化爲小因素：物質的精神的因素，我們會發現這個所謂事實是一般規律(*lois générales*)、特別的時空形勢、悲劇中每個有名或無名的角色所處的特別情況所混合起來的結果。轉眼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盤根交錯的史實迅速分化、分解……這是現成的資料嗎？不是，這是歷史學家的創作，多少次的創作呢？這是利用假設、估計、透過精妙和令人迷醉的工作不斷的發明和創造。」

## 三、年鑑學報・經濟・社會・文明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年鑑學報』和圍繞着它的史學家繼續爲新歷史而努力，讓它有新的躍進。在法國淪陷期間因逼於形勢曾數次易名，到了一九四六年終於找到新的命名，標明了它領域之擴大，直至今天它仍叫『年鑑學報・經濟・社會・文明』。請注意這些名詞皆屬衆數：是人，不是人類(*les hommes, non l'Homme*)，這是費夫爾和保洛克不斷重複的概念。衆數的經濟與社會讓我們聯想起早期『年鑑學報』的命名，至於衆數的「文明」一詞是兩個創辦人很愛用的，因爲它的涵意廣闊，把物質的精神的連在一起（當然，這時保洛克已爲德國人槍斃（一九四四年），但他是精神不死的）。保洛克在他的史學「遺稿」裏（即他的『歷史底辯白或史學家的事業』），提及幾梭(Guizot)時，就像預先爲「文明」的衆數作解釋似的：「我們承認在任何一個社會裏，所有東西都是互相關連的：政治與社會架構、經濟、信仰、和心態最基本最微妙底顯示。」

### (一) 一個問題性(*problématique*)的歷史，不是「自然顯現

(*automatique*)。

『年鑑學報』換了新名字後，在費夫爾領導之下希望得到更普遍的了解。他們要提出歷史的問題：「要拿出問題性的歷史，不是自然顯現的歷史。」他們比以前更想提出現代史的問題，因爲他們希望「在一個永恆地不穩定的狀態下的世界」中生活與理解。因此，雜誌一開始便以國際性爲標準。雖然當時還是西方文化，尤其是歐洲文化爲主，但是目標始終是儘量對外開放，要超越及反抗歐洲中心主義，以求到達全世界，尤其後來我們稱爲第三世界的地方。

踏入這個新階段之前，『年鑑學報』兩位創辦人在二次大戰初期已發表了兩本「爲後來歷史作出綱領」(*programmatisque*)的經典之作：保洛克的『封建社會』(*La société féodale*)和費夫爾的『十六世紀不信的問題：哈伯雷的宗教』(*Le problème de l'inconscience au XVI<sup>e</sup>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前者是一個問題性的、綜合性的、平實的比較性歷史的典範，告訴我們怎樣「觀察和思考」，超越了法學的制度史而走向一個談及社會階層的社會史，一個論及各種權勢、權力的歷史。後者發掘了「十六世紀宗教生命」的深處，肯定了思想、感情、信仰的長久持續時間(*longue durée*)，打破了哈伯雷是自由思想家這個有時間謬誤的迷信。保洛克另一本未完成、未校閱的遺作，很快地便有英譯本（譯案：*The historian's craft*），所以新歷史得以被介紹到國外。這本書最近甚至在東歐都有譯本（特別是一九七三年的俄譯本），這就是『歷史底辯白或史學家的事業』。這本書，如費夫爾所說

我這樣不厭其煩地贅述這個爭辯是因爲我希望釐清新歷史的基本立場。我想所有以新史學爲事業的人大致都會同意費夫爾的看法。無疑地湯恩比的歷史甚具誘惑力，視野廣闊同時亦具有整體歷史的意願，但是這個零亂的歷史，明顯地亦必然地是一個三手歷史，想不勞而獲地找出哲理的歷史，是不屬於我們的。

「並非一史學方法」，亦非「虛假的歷史哲學論述」，而是「重審一些錯誤的歷史想法及實踐。」

(三)新歷史的奮鬥  
——是反對「本源的偶像」，如阿拉伯諺語所說：「與其說人像他們的祖先，不如說更像他們的時代。」一是注意古與今之關係，即是說：「因過去了解現在」同時亦「因現在了解過去」，因此一個「謹慎的倒退」研究法是必要的。

費夫爾曾把他討

門」。一開始便是「信仰的表白」，我已經提過其中要點，裏面的文章所說的「舊門」是針對政治史、外交史、「教科書歷史」、哲學歷史及所謂「述說的歷史」(*histoire historisante*)，即基於紀事的歷史，被動地面對史實，沒有問題的歷史，只是呆板地竊食文獻，就像我們談今日的政治時所說「政客的政治」(politique politique)一樣。

另一方面，他們要為一個「有領導的歷史」而奮鬥，這個詞今日聽來有點刺耳，其實它的原義不外是提倡有合作性的探討的歷史。《年鑑學報》一開始便舉了不少例子來闡明它心目中「歷史的前途」：例如一連串關於地籍(cadastre)、土地分散情形、農業技術及其對一般人對貴族的影響的探討。這個方向帶來了豐富的收穫，自一九四八年開始高級實踐學校(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亦極力支持。一九五八年後，各大學的歷史系已深受影響了。

再一步是放眼觀察我們的「鄰人」，目的是希望與這些

(十一)與布魯代爾走向另一個歷史  
另一方面，在費夫爾的號召下，後來法國新社會學之父  
爾殊·費利德曼 (Georges Friedmann) (他的社會學是充滿  
史的) 和兩個年青的史學家布魯代爾與沙爾·摩哈謝 (Char-  
Morazé) 把年鑑學報的歷史推向古今互相照耀的一個高潮。  
很快地布魯代爾爲新歷史寫了他的鉅作：「腓利浦二世  
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發現布魯代爾的費夫爾在一篇題  
「走向另一個歷史：腓利浦二世時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文章中這樣寫道：「費爾能·布魯代爾的論文爲我們帶來了  
新的局面，在某個意義上，這是革命性的。他果決地把西班牙  
的政治（廣義上的）企圖放入歷史和自然地理的範籌中。先  
研究影響人的意願的永恆動力 (forces permanentes)，

動力於無形中加諸人身，並左右他們的行爲。這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分析。我們日常漫不經心地說的『地中海』，經他一分析變成一個有引導性的可厭的、有制止作用的或相反地令人奮發的，加速了人的鬥力比賽的主要動力(*force guidante*)。書的第一部份叫『個別動力』(*forces particulières*)，有一個常數爲二部份叫『個別動力』(*forces particulières*)，有一個常數爲這些動力賦予生命，那就是羣體的自然的(*impersonnelles*)動力。

浦二世統治期間的動力。第三部份是歷史事件，風湧雲起，洞亂的史實——往往爲第一部份所論的永恒動力所吸攝，爲第一部份所分析的平穩動力 (forces stables) 所影響及帶動的——但還有偶然的因素。「偶然」爲連鎖事件的歷史畫布上繡上

卷之三

如陌路人般的兄弟」能建立思想上的交流。這個理想往往是令人失望的。困難之一是言語上的障礙（但史學家有時却能用一個極有限但十分牢固的歸納法和無懈可擊的經驗去發現一個歷史的角度，並不受到文獻的言語困難所阻撓。），此外，又例如心理學亦似乎很難跳出本身的範圍而與歷史學有所溝通，而有些史學家的確是需要向心理學家請教以求達到一個成功的歷史性心理學。同時還有一些學科因為缺乏有遠見和能發現問題的專家，繼續緊縮在自己的角度之中，讓新歷史學家只能望洋而歎，如文學、哲學、藝術、科學就不會對新歷史有過重大的貢獻。

430

一九五六年費夫爾逝世。布魯代爾在何卑爾·芒德魯 (Robert Mandrou) 和馬克·費洛 (Marc Ferro) 協助之下成爲『年鑑學報』的主要領導人。一九五八年他發表了最深刻地代表了當時新歷史的文章：「歷史與社會科學：長久持續時間 (longue durée)」。到一九六九年布魯代爾、摩哈謝和費利德 (Maurice Halbwachs et Fernand Braudel) 把編輯的工作移交給一個新的小組：安德烈·布爾幾耶爾 (André Boulleau)、馬克·費洛、傑克·哥夫 (J. Le Goff)、艾曼奴耳·萊·華·拉杜里和傑克·瑞非 (Jacques Revel)。一九七九年爲『年鑑學報』五十週年紀念的大日子，到時他們會爲當前的歷史作一交代。

但在爲今日的新歷史作定義之前，我們應該再重溫一下新歷史的悠久淵源。

作者簡介

傑克·萊·佛米(Jacques Le Goff)出生於一九一四年。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歷史系畢業。曾到布拉格、牛津、羅馬等地深造。自一九六一年開始在高等師範學院第六校任教，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七年為該校(當時易名為高等社會科學院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校長。現為國家科學研究院委員、《年鑑學報》編輯和幾個出版社的編史編輯。他的主要研究範圍為歐美中古史。

浦二世統治期間的動力。第三部份是歷史事件所受的影響，爲第二亂的史實——往往爲第一部份所論的永恆動力所吸攝，爲第二部份所分析的平穩動力 (forces stables) 所影響及帶動的一但還有偶然的因素。『偶然』爲連鎖事件的歷史畫布上繡上三最奪目，最不可預料的變化。」

# 新歷史（中）

傑克、萊、哥夫著  
染其姿譯

## 五、新歷史之先驅

遠在年鑑學報成立之前，自十八世紀以來已有好幾個響噏的人物為新歷史鋪了路。

### (一) 早已制定新歷史之綱領的伏泰爾 (Voltaire)

伏泰爾在『重新思索歷史』(Nouvelles 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一七四四年)一書裏這樣寫着：「有一天，在物理學界發生的事可能會降臨於歷史學——新的發現會否定舊的系統。這件滿有意義的事情如今已成為自然哲學的基礎，它亦將會激發我們要認識人類的欲望。我們很幸運地擁有各種各類檔案讓我們可以抽查所需的資料。目前，我就像翻大辭典一般地看林林總總的鉅著。但是，在看過三、四千個戰役的描述、幾百種條約的內容後，我發覺，基本上我並沒有知道得更多。我只多認識了一些事件而已。讀了沙爾·馬爾丁 (Charles Martel) 戰役後，我並不能更深入地了解法國人和阿拉伯回教徒 (Sarrasins)。塔美爾蘭 (Tamerlan) 戰勝了巴亞澤特 (Bajazet) 這件事又豈能讓我更認識韃靼人和土耳其人呢？！我想知道一個國家在其戰役之前的實力，和戰役到底有沒有加強了或減低了她的實力。西班牙在征服新世界前是不是比今天更強盛呢？查理五世時的人口比腓利浦四世時增多了多少？爲甚麼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在兩百年前只有還不到二萬的居民？」

而今天却住了二十四萬人？我們怎樣才能肯定地得到答案呢？英國今日的人口比在亨利八世時增加了多少？……這些都是任何想以公民 (citoyen) 和哲學家的身份來讀歷史的人都感到好奇的問題。如果他想抓緊這方面的知識那麼，他所涉獵的會十分廣泛：他會探討一個國家最根本的弱點 (vice) 和最主要的優點 (vertu)。爲甚麼一個國家會雄霸海上，她怎樣在一個世紀之內變得富強，同時，到底富強了多少？出口記錄冊會給他提供一些線索。他會希望知道各種藝術和製造業是怎樣建立起來的，他會追溯這些技術傳播到國外然後又返回發源地的各條途徑。最後，他會着力研究道德習俗 (mœurs) 和法制 (lois) 的轉變。這樣，我們會得到一部人的歷史，而不是皇帝皇族的微不足道的歷史。我閱覽過法國年鑑，結果一無所獲：我們的史學家對上述這類細節一概三緘其口。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 (我是人，我不自外於任何關乎人的事物)。這句銘言，他們都沒有放在心上。」

經濟、人口歷史、技術和習俗的歷史而並非只是政治、軍事和外交歷史。這是人的歷史、所有人的歷史、而不單是帝王和大人物的歷史；各種結構的歷史而不單是事件的記載；一個在運動中的歷史，描寫各種演化 (évolutions) 和轉變 (transformations) 的歷史，而不是一個凝固的歷史畫面；能作解釋的歷史而不是單純敘述的歷史、或敘條的歷史。最後是整體歷史……

……這個歷史綱領已制定了兩百多年了。在十九世紀的上半葉，夏鐸布里昂 (Chateaubriand) 和幾梭 (Guizot) 分別把這個綱領再重提一次。

### (二) 夏鐸布里昂名符其實的宣言

夏鐸布里昂的『歷史研究』(Etudes historiques) (一八三一) 的序言是新歷史名符其實的宣言：「古代的社會湮滅了，但在它們底灰燼上新的社會建立起來。所有法例、習俗、沿用、習慣、意見和原則等都變了。一個大革命已完結，另一個大革命正要發生。法國應再重寫她的年鑑，注上有關智慧的進步。分析上古的史學家並沒有紀錄各種重要的經營——科學、藝術、公立教育都被摒棄於歷史領域之外。歷史女神克萊歐 (Clio) 以前曾踏着輕快的步伐，因爲她拋開了沉重的包袱。今日

他的話呢？如果我們不知道皇帝馬褲的顏色和銀馬克 (著者案：法國古時值錢金屬的重量單位) 的價值，我們不能算認識這個社會。史學家不單要知道他本國的歷史，還要通曉鄰國的歷史。面對浩翰的事物他應該有一個哲學性的概念來引導他的思想。這就是現代歷史累贅之處。因爲這些累贅，我們很可能再不會有如修昔底的斯 (Thucydides) 繆特-利夫 (Tite-Live) 達斯特思 (Tacitus) 一類的史學家。不過我們再不能逃避，我們勢必要屈服在這些累贅之下。」

這無疑地又是整體歷史。在那裏，經濟的、藝術的、人類學方面的研究佔首要位置。這是一個談物價、經濟政治的歷史 (非政治史)，一個「哲學性」的歷史，也就是一個談問題、解釋問題 (problématique et explicative) 的歷史。這個歷史甚至願意犧牲華麗的文體，放棄史學家應同時是文學家、藝術家的一切，從天文到化學，從財政藝術到製造業藝術，從畫家、雕塑家、建築家的知識，到經濟學家的知識，從宗教、民事和刑罰的研究到政治法則的研究。一個現代的歷史學家不會錯過一個涉及愛情或道德習俗的故事。他研究的重心可能是鹽稅或而是另一種稅制。戰爭、航海、貿易等紛紛走入他的研究範圍。當時的武器是怎樣製造的呢？建築的木材究竟從那裏來？一磅胡椒賣多少錢？如果作者不知道一年是從復活節開始的，而不是從一月一日開始的，那麼他的研究等於是白做了。(著者案：在法國本來一年是從復活節開始，直至查理九世欽定自一五六四年開始，每年才從一月一日起計算。) 如果作者在引錄時誤錄頁數，又或者弄錯了版本，我們又怎樣再能相信

(三) 以文明爲歷史研究對象的幾梭

在這之前不久，於一八二八年，幾梭在他的課程：「現代史：自羅馬帝國之沒落至法國革命之歐洲文明」裏開宗明義第一課就教學生怎樣把文明作爲歷史之研究對象：「近來我們談到很多關於把歷史鎖進事實之內和述說 (raconter) 的需要，沒有比這件事更真切的了。不過，所要述說的事實可能比我們想

像的要多：有肉眼能見的、物質的事實。如戰役、戰爭、政府的公文；也有道德的、隱藏的但同樣真切的事實。有個別的有名字的事實，但亦有普遍的、無名的、沒有時間準確性的、輪廓模糊的事實，但它們亦同樣是事實，如果摒除了它們，歷史不免會被歪曲……諸位，請想想：文明這個事實就是最純粹（par excellence）的事實，是最普遍的（général）和最終的（définitif）事實，所有其他事實皆凝聚其中而得到最典型的表現，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拿構成一個民族的歷史的所有事實來談——即我們通常所謂的一個民族的生活因素，又或者拿這個民族的各種制度、貿易、工業、各戰役和政府的各種細節來談，如果我們要把這些事實整體地分析，並思索它們之間的關係，衡量和判斷它們，我們會提出甚麼問題呢？我們會問，它們對這個民族的文明作出了甚麼貢獻？它們扮演了甚麼角色？它們產生了甚麼影響？……各位，我的意思是，我會問：這個如此凝重、如此廣闊、如此可貴的事實，這個好像總括了、表達了人民整個生活的事實，究竟是甚麼？在了解這點之後，我們再研究它的歷史，再分析它的本身。……長久以來，在很多地方，我們都用「文明」這個詞，而對於這個詞我們往往只有不太清晰的、較為廣泛的概念。不過，反正大家都在用這個詞，大家亦有一定的溝通。我們要研究的就是這個詞普遍的、屬人的、民衆的意義。」

不錯，如沙爾、摩哈謝巧妙地說，幾梭是他那個時代的人物，是「勝利的中產階級」的發言人，因此不免在文明這個概念裏看見進步（他曾說：「我認為，進步與發展是文明這個詞裏最基本的概念。」）不過，我們得承認，在上述這段話中，

一方面是一個更關心物質的歷史，為物質文化歷史開了路，即是說更注意氣候、食物及各種物理環境的歷史；另一方面是一個探討精神因素的歷史，一個研究道德習俗（moeus）的歷史。他與伏爾泰（伏泰爾曾著《論道德習俗》）的先後呼應拓開了人類史學（*histoire anthropologique*）的天地，把我們的時代帶回「道德習俗」這個美麗的觀念。

(B) 反對史學家的「偶像」的經濟學家西彌昂

在這裏提到西彌昂可能教人覺得意外，因為西彌昂（一八七三——一九三五）不是歷史學家，而是一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同時他也不及前述幾個顯赫的史學家來得有名。

不過，西彌昂對新歷史確有他的貢獻。作為經濟學家，他鞏固了「循環」（cycles）的理論，替歷史綜合雜誌構思了主題，和鼓勵了《年鑑學報》的成立。不過，在這裏，我們更自然地聯想到的是他那篇不朽的文章：「歷史方法與社會科學」。他借用培根（Bacon）的比喻法指責「史學家部族的三個崇拜偶像」：

〔1〕「政治的偶像」——這是最普遍的研究。至少，史學家對政治史、政治事實、戰爭等一直不斷地關注，以至給予這類事件過份誇張的重要性。

2. 「個人的偶像」——或者說，這是歷史傳統的積習，

即把歷史看成是幾個人物的歷史，而不是事實的研究。所以時至今天，仍有很多的研究及著作是圍繞在一個人物上的，而不是以制度（institution）或社會現象，或一些應建立的關係為中心……。

3. 「時序的（chronologique）的偶像」——即慣常地迷失在探討本源的問題裏。只追溯一些個別的變化而不

我們隱約地聽到費夫爾在一九三〇年首屆國際綜合討論所提出的論文：「文明：一個詞和一組觀念（idées）的演變」。一九四六年他以衆數的「經濟、社會、文明」作為《年鑑學報》的副題，如保洛克在他的「歷史底辯白」中強調「文明、衆數的文明」一樣，重申這重要的一點。

不過，新歷史最重要的先驅還是米殊利（Michelet）和一個法國經濟學家弗郎絲瓦·西彌昂（François Simand）。

#### (四) 新歷史的先知米殊利

新歷史的先知米殊利不單在他的作品裏顯示出他的先知先覺，他過人的洞察力在他的鉅著《法國史》（*L'histoire de France*）的序中早已表露無遺：「她（法國）有年鑑，但沒有歷史。著名的學者只是從政治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從來沒有人探索過歷史活動各類的發展裏無限的細節（宗教方面的、經濟方面的，藝術方面的等等）。無數自然的地理的因素構成歷史，但沒有一個人會透過這些因素的充滿生命的結合的這個角度去放眼看歷史。首先，我把歷史看成一個靈魂、一個人……然後，我所提的歷史問題就更複雜、更駭人了——我要生命全面的復活，這不是指表面的事物，而是它內在極深的組織……總括的來說，我認為這些名學者（其中還有幾個我是十分佩服的）筆下的歷史在下列兩點上顯得太薄弱：一是物質上的——他們只顧及種族而忽略了土地、氣候、食物和其他許多物理上、生理上的條件；二是精神上的——他們只論及法律、政治法案而疏忽了思想、道德習俗、一個國家的靈魂的大演進。」他再一次地反對只涉及政治的歷史，而希望有一部整體的深刻的歷史。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他肯定了新歷史的兩個主要方向：

打倒政治史是《年鑑學報》的頭號目標，至今仍是新歷史最主要憂慮。就算新政治史或者政治的新觀念在新歷史的範圍內出現（我往後會再提這一點），這仍會是關注的目標。在消除人物歷史方面，努力的成果已甚為可觀，儘管這種虛幻的表面的歷史在「形似歷史」（para-historique）和「假歷史」（pseudo-historique）的作品中仍是大行其道。而在另一方面，新歷史亦應重審歷史人物的問題以便給予傳記作品一個新的科學性地位。在這裏，我們聯想到的並非費夫爾的馬丁路德傳。而是央斯特·康陀羅維茨（Ernst Kantorowicz）的「費特力二世」（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和古卑爾的「路易十四與二千萬法國人」。最後是歷史家應反省年代次序的習慣。這是新歷史的首要任務之一，我會再回到這個問題上面的。大體上，這方面的進展可說是過於快慢。或者可以說，我們所能做到的不完全是西彌昂所冀求的抽象的時間操縱，而是把時間的豐富性加以考慮，新歷史應轉向長久持續時間（longue durée）的研究，細心經營其中準確的法則。

## 六、是否為法國史學

看來，新歷史是法國的史學。這樣說也對了一大半。就我本人所知，在這方面並沒有深入的研究……不過，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可以互補的假設。一是，在法國，自十九世紀以來，甚至可說自十七世紀以來，歷史在我們後來稱為人文或社會科學的領域上扮演了聯合（fédérateur）和先鋒的角色。我們已略談過幾個偉大人物在這方面的貢獻。在英美國家，現代的社

會科學由社會學或人類學帶領，在法國，領導的却是史學。高等實踐學院第六校自一九四七年以來創業的情況、研究的綱領和活動都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在英國，經濟科學和政治經濟學都很早熟，但美國的影響部份地壓抑了史學同樣的發展。

如果撇開這點不談的話，法國是現代大國之中唯一擁有古老史學傳統而又能繼續保持這個傳統的國家。這個傳統不但連繫着政權和意識形態中心（帝制、教會），而且與社會演化（貴族歷史，中產階級歷史）分不開。同時，法國早在十二至十五世紀便有民族感（sentiment national）的逐漸形成，這個早熟的發展亦與史學傳統有密切的關係。貝爾那爾·給尼（Bernard Gréneau）最近領導的一項研究（「中古的史學研究」）顯示了法國史學自中古以來的活力與重要性。

假設之二是，法國的史學傳統避免了兩種影響。這兩種影響在其他各國，如德國、意大利、尤其是英美兩地，把歷史中談及日常的、切實的部份窒息了，或至少是引開了，而這是新歷史最精采的雕琢。我要說的是哲學的影響——尤其是歷史哲學——和法學（droit）的影響。法學史往往與真實（réel）隔絕。這一一旦與實證主義的博學結合來後便產生了許多如保洛克所說的：「只管理首在檔案室裏的十包子。」法國史學從來沒有被維柯（Vico）（雖然他令米殊利傾倒），黑格爾（Hegel），卡萊爾（Carlyle）一類的人物支配過。較近期的如史賓格勒（Spengler），克羅齊（Croce），湯恩比等在法國也沒有同類。法國史學家的遠離歷史哲學很可能解釋了為甚麼十九世紀的泰納（Taine）和今日的雷蒙阿宏（Raymond Aron）對法國職業史學的影響是那麼有限了。

不過，我們當然不能因此把新歷史偏促在荒謬的民族主義裏。首先，新歷史對分異特別敏感。在任何地方，只要有發展

的機會，新歷史便會循着適合於當地的途徑發展，這個現象已慢慢開始了。還有，我們亦不應忘記一些外國學者對新歷史的誕生所作過的貢獻：皮樂、委星加（Huizinga），馬克斯（Marx）的影響更不在話下了。

#### (二) 法國以外的新歷史

最主要的還是新歷史在法國以外亦有相當優秀的表現，其成就亦往往有領導作用。在期刊方面，上面已提過的德國期刊《經濟與社會季刊》對《經濟與社會歷史年鑑報》的誕生有重大的影響。今天，英國的《古今》（*Past and Present*）雜誌（一九五一年創辦）與《年鑑學報》同等地代表了新歷史。此外英美的《社會學與歷史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一九五七年創辦）為廣義的社會史的更新貢獻不菲。英國以外，意大利對新歷史亦特別開放，好幾家出版社在這方面的活動都證明了這一點。在這裏，我隨意地引幾個在人類史學界佔首席的外國學者（當然還有許多數不勝數的名字）：美國的娜泰莉·西蒙·戴維絲（Natalie Zemon Davis），意大利的卡爾羅·更斯堡（Carlo Ginzburg）；還有波蘭極成功的史學派產生了當今最優秀、最創新的人物，如布羅尼斯羅·格里梅克（Bronislaw Geremek），他那本關於十四世紀巴黎的「邊緣人」（marginaux）的書，實在膾炙人口。又如維陀德·古拉（Witold Kula），他更新了經濟和社會史的馬克思主義模式（modèles marxistes）。他在這方面的成就不單表現在他的經濟史鉅作中，更重要的應該是他那本關於封建主義的一個新模式的論文：「封建制的經濟論」——十六至十七世紀波蘭經濟的模式」，在西方引起了強烈的興趣。他的另一篇「措施（des mesures）與人」又說明了社會鬥爭的歷史怎樣影響了日常生活策略。

## 史學與人類學

李維·史陀著  
蔣維斌譯

一九〇三年豪瑟（H. Hauser）與西姆（F. Simmian）分別著文區分史學與社會學二者原理與方法上的對比，至今已半世紀有餘了。照這兩位學者的看法，史學與社會學的不同基本在於：社會學方法具有比較的性質，而史學方法則以使用文獻與探求事件的相互影響為特色（註一）。他們倆雖然對這兩門學問性質上的區別看法一致，但在評估兩種方法的優劣上却各持己見。

其後的發展如何呢？我們無法否認，史學始終忠於它最初中庸明陽的學風，至今迄無背離這條道路的跡象。以史學的優越地位而言，原理與方法上的問題似乎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

社會學的情況則大不相同。我們在此要特別討論的社會學的支派——民族誌與民族學，在過去三十年中出產了大量的理論

性與描述性的研究，而在這種高產量的背後，却包含著人類學內部的許多衝突、分裂與混淆。這些衝突分歧的情形和當年民族學由史學中另立門戶的狀況相仿，却又不及當時那種一刀兩斷的程度。頗為自相矛盾的是：我們經常看到歷史學家的理論被人類學家在字句上加以引述，而作這些引述的偏倚又常是那些宣稱反對史學方法的人類學家。只要我們簡略地追溯一下起源，同時勾勒出一些初步的定義將問題加以澄清，就不難了解這整個情形。

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將不使用「社會學」（sociology）一詞，因為這個字眼從來沒有如涂爾幹（E. Durkheim）和西

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將不使用「社會學」（sociology）一詞，因為這個字眼從來沒有如涂爾幹（E. Durkheim）和西

(四部叢刊), 卷四八, 頁十三下。

註一四八：脫帖木兒，原作脫木帖兒，嘗誤。前引墓誌銘及元史月略有不花傳皆作脫帖穆耳，爲蒙文 *Tsch Temir* 之音譯，意爲鐵

鐵，而脫木帖兒則無意義，茲改之。

註一四九：脫帖木兒（一二六一——三四四）於大德十年（一二〇六

）任武德將軍、蘚縣萬戶府東平等處上千戶所達魯赤，轉宣威將軍、明威將軍、坐鎮明州、越州，前後三十餘年，卒

於至正四年，年八十四，見前引墓誌銘。

註一五〇：據前引墓誌銘增哈魯氏·高氏，原文僅列朱氏，嘗爲其生母。

註一五一：脫額（一二〇八——？），事跡不詳。

註一五二：野仙脫因（一二〇九——？），事跡不詳。

註一五三：元史氏族表（貢三七）作南爾。

註一五四：已巳即大曆二年（一二一九）。

註一五六：壬申即至順三年（一二一九）。

布魯海牙（一九七一——一六五），爲元初名臣，歷事五

朝，追封魏國公，因曾仕燕南道肅政廉訪使，其子孫皆以廉

爲氏。布魯海牙九子五十三孫，類多顯赫，爲元代最重要的

色目家族之一（見元史，卷一二五，頁八下——十一上，布

魯海牙傳；元明善，「平章廉文正王神道碑」，國朝文類，

卷六，頁一上——十六下）。此一廉某，即爲布魯海牙之裔

，但不知出於何支。元史氏族表（貢四六）說：「案元統元

年進士錄，有廉氏登第授國史院者，紙燭脫失其名字，其父

名廉甫，大夫贈陽郡侯，諡真惠，名亦殘缺。曾祖魏國公

謚孝懿，即布魯海牙也」。

註一五七：懿字原脫，據元史布魯海牙傳（卷一二五，頁十一上）補。

註一五八：此處脫落數字，可能爲文散官銜將仕郎或將仕佐郎，見元史，卷八一，頁十八上。

## 翻譯新歷史（下）

傑克·萊·哥夫著

翻譯

### 五、今天的新歷史

在『寫作歷史』一書中 (*Faire de l'histoire*, J. Nora, J.

Le Goff, edt. Paris: Gallimard, 1974), 當代法國史學家不但以更新了傳統史學領域的新問題、新方法來爲新歷史下定義，他們更重視在史學範圍內出現的新研究對象——這些專題已往只屬人類學（在本書我們分別論及「給養」、「身體」、「表演動作」 (*gestes*)、「影像」 (*images*)、「書籍」、「神話」 (*mythe*)、「性」等專題）。我本人則認爲新歷史同時亦決定於五十多年來其不同方向的新發展和嶄新的研究角度。面對史學各種趨向與慣性，甚麼是這些新方向的中心問題呢？這是我希望在這裏指出的。

#### (一)長久持續時間 (longue durée)

新歷史的所取決的研究角度中最具有啟發性的莫過於長久持續時間。歷史的步伐時快時慢，但其深層的力量只可以在一個長時期中活躍和被掌握。馬克斯明白了這一點。透過生產方式的概念、透過從奴隸制到封建制再到資本主義的理論，他指出只有歷經數世紀的系統才能構成歷史。我們可以用其他方式去決定歷史的構成。例如，我們可以用道德習俗或心態 (*menta*, *lives*) 來衡量歷史，或者可以憑據各種技術或各種能量（先是人力，然後是畜力，再然後是機動能量）的發展，甚至隨着人面對基本的現象與問題之態度——例如工作、死亡（貌

註一五九：□□達（一二〇八——？），其名前數字脫落，已不可考。

註一六〇：元史氏族表（貢一七）及蒙兀兒史記（卷一五三），頁十七下花傳皆作脫帖穆耳，爲蒙文 *Tsch Temir* 之音譯，意爲鐵

鐵，而脫木帖兒則無意義，茲改之。

註一六一：原作從住，似爲從仕之誤。

註一六二：燕質饑（一二〇一——？），事跡不詳。

註一六三：昔實恭 (*Shat'uchi*)，即養廬人。參看 *Hsiao-Ch'i-ch'ing*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Cambridge, Mass., 1978), p. 216, No. 42.

註一六四：妥桓，原作妥桓。從元史氏族表（貢一五）改。妥桓，嘗爲蒙古文 *Togtoh* 之譯音，通譯作孛可孫，爲專治芻粟。

註一六五：「愛熙」，舊蒙文 *ayimagh* 之譯音。楊瑞山居新話（知不足齋叢書，頁一上）說：「各愛馬，即各投下」。投下指分封於諸王，功臣之封邑，包括土地及人民。參看陳述，「投下釋義」，東北集刊，第一期（一九四一年），頁一——十；

村上正一，「元朝に於ける投下の意義」，蒙古學報，第一期（一九四〇年），一六九——一五一。

註一六六：鉢可孫爲蒙古文 *ökkeün* 之譯音，通譯作孛可孫，爲專治芻粟，又訛。見元史，卷十九，頁十八上，參看 F. W. Cleaves, "Pökesün-Pökigü",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XXXV* (1964), 384-393; "Addendum to Pökesün-Bökigü", *Ibid.*, XXXIX (1976), 49-52.

註一六七：原作熱札化臺，從元史氏族表（貢一五）補。

註一六八：壽同（一二〇六——？），姓名殘缺，無法考見其事跡。

註一六九：湯字偏旁原缺，茲從元史氏族表（貢六九）添。

註一七〇：路名原缺。按元代慶州廳安豐路，見元史，卷五九，頁十八下。

註一七一：明□（一二〇一——？），姓名殘缺，無法考見其事跡。

註一七二：山東河北蒙古古軍大都督府，係元代軍事機構中唯一有「都督府」字樣者（見元史，卷八六，頁一〇上），故補之。

Marcel Mauss) 所稱的「身體的技巧」(« Les techniques du corps », *Journal de Psychologie*, 1936), 以至進食的方式

、衣着的方式、居住的方式等事物亦越來越關注。這原是我與弗朗絲瓦·夫雷 (François Furet) 共同嘗試描繪的「原始的人和日常的人」的一個研究計劃。因此，我們需要經營另一套歷史方法，主要是為了處理這個歷史所採用的一些以往被唾棄的文獻資料——文學性的資料、紀錄了卑微的日常現實的檔案——即「人學文獻」(éthnotextes)。

不過，史學與人類學的靠攏亦不是沒有問題的。人類學在最近數十年來主要是研究歐洲以外的地區。探討已發展的社會這個工作就落在民俗學 (folklore) 手中。民俗學所搜集的資料往往豐富但却不被充分地恰當地利用。這樣，民俗學被貶為次等的民族學。新歷史和民俗學在這方面往往是同病相憐的，但人類學仍滯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在另一方面，新歷史所感興趣的是善於辨出各種分別的民族學，而人類學却只關注抽象化後的人類，——結構主義的影響只是部份地解釋了這個情況——對新歷史的吸引便減少了許多。「古人的心靈」(l'âme sauvage des sauvages) 比「野性的思考」(panse sauvage) 更符合史學家的興趣。當然，我們得承認古羅德·雷維·斯陀羅斯 (Claude Lévi-Strauss) 的『野性的思考』一書影響了整整一代新史學家對「神話」(mythe) 的研究。

□ 歷史與其他人文科學  
歷史與人類學特別密切的關係並不能抹煞新歷史爭取與其他人文科交通的努力。法國的杜爾干 (Durkheim) 社會學派對『年鑑學報』的成立曾產生過不可否認的影響。不過，其後，

聞——即歷史——的方法以研究空間的現象，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可以希望歷史與地理學之間的關係有新的進展。史學與心理學語言學之間的溝通就更不明朗了。社會心理學的發展對社會學而不是對史學有利。而科學性的心理學的進一步則更接近自然科學 (或稱生命的科學 sciences de la vie) 而不是人文科學，徒令心理學與史學之間的隔膜繼續甚至加深，朝着心態 (mentalités) 這個觀念發展的羣體心理歷史底進步並不吸引心理學家，反而增加了兩者之間的距離。至於結構主義色彩甚濃的現代語言學亦不會靠近新歷史，儘管史學家對如愛彌里·邦維尼斯特 (Emile Benveniste) 般的語言學家的著作及記號學、語言記號學都甚感興趣。這些語言學家在一九七五年易名為高等社會學院的高等實踐學院第六校已設有課程。除此之外，還有三個很有意思的，但成就仍有限的發展。

其一發生於人文科學本身的領域內。這就是心理分析學所引起的興趣，帶來了心理分析歷史的誕生。這個發展在英語系國家更為蓬勃。在法國，米修·雪爾投 (Michel Certau) 和阿倫·貝桑松 (Alain Besançon) 分別開拓了這方面的途徑。不過，這類的研究至今仍困難重重：例如心理分析學如何才能很科學地從個人伸展到羣體，又如怎樣能解決許多史家對榮格 (Jung) 的學說的懷疑。當然，如阿爾峰斯·杜布龍 (Alphonse Dupront) 與路易·幾敘里根瑪 (Luigi Autrigemma) 等研究這方面的史學家認為榮格的一套已經是較適合史學家所需的了，但總的來說，這類困難目前中止了這方面的繼續探討，可能這只是暫時性的。

其二是歷史與一些精確科學的匯合的發展，尤其是與數學

雖然我們會有胡爾殊、費烈德曼 (Georges Friedmann)，布魯代爾與胡爾殊、古爾維茨 (Georges Gurvitch) 的交情亦特別深厚，但是史學與社會學並不會有過很豐富的交流經驗。社會學躊躇於一個抽象的哲學性教條性的談論與非常經驗性的方法之間。這些經驗性的方法的第一步往往是設問卷，而問卷後面却不見得當有一個牢固的問題 (problématique)。所以，新歷史不容易找到一個與社會學交通的語言。而在社會學家方面，歷史的不斷擴大的目標頗令他們感到不安，他們認為歷史太概念化，在他們眼中，歷史依然不外是一大堆例子和經驗的儲存庫。

史學與經濟學的交流亦同樣困難。當然，經濟史的發展及其在新歷史中不可缺的地位在兩者之間築了橋樑。不過，經濟學之日益專業及技術化以及數理經濟學之專橫、經濟學家之只傾向短期中期的研究，難免引致兩個學科之發展方向關係的不平衡。然而，經濟學家如塞爾殊·克利斯朵夫·科牧 (Serge-Christophe Kolm) 之參與『年鑑學報』說明了這種關係在改變之中。又如史學大師胡爾殊、杜比 (Georges Duby) 從經濟和社會史的基礎出發，把各種顯像系統 (systèmes de représentations) (譜劃) 向進歷史以擴大其領域，亦無疑推進了這方面的發展。

地理學目前的危機帶來了其與史學之間的關係淡化。過去地理學對保洛克、費夫爾和布魯代爾的思想以至不久以前的『年鑑學報』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在上面我們已提過這一點。在今後，如果地理學復興，即是說如果地理學能找到一個新的空間問題 (problématique de l'espace) 和更妥善的引入時方面的發展。

地理學對保洛克、費夫爾和布魯代爾的思想以至不久以前的『年鑑學報』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在上面我們已提過這一點。在今後，如果地理學復興，即是說如果地理學能找到一個新的空間問題 (problématique de l'espace) 和更妥善的引入時方面的發展。

○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數學的誕生。不過，至目前為止，這個發展似乎對社會學、心理學、地理學和語言學更有利用價值。

最有前途的發展可能就是人文科學 (首先是歷史) 與生命的科學間藩籬之降低甚至摧毀。新歷史追求重建一個完整的歷史，他們要把人的身體生理放進一個社會性的時間之中。另一方面，一些生物學家又相當殷切地把他們的科學的歷史經營為一種研究工具，而這種歷史探索的重點不是其外在的發展，而是內在的發展以求達到把研究擴大到人的環境 (écologie humaine) 的層次上面。如果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必然得引進史學、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人口學及純粹的生物學。這個發展帶來的是一個十分廣闊的天地，新歷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決定性的。

### (II) 心態歷史 (L' 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路西恩·費夫爾和馬克·保洛克深為歷史中的羣體心理及精神現象所吸引，給歷史開創了新的研究方法，就是心態 (mentalités) 的研究。費夫爾只探討了這個新領域的其中極重要的兩點——即心態工具 (outilage mental) (譜劃) 與感性 (sensibilités) 的概念。意大利的青年史學家阿爾卑投·特能蒂 (Alberto Tenenti) 就是受了費夫爾的影響轉向研究人面對死亡的感性，他的著作『透過十五世紀的藝術看生死』(La vie et la mort à travers l'art du XV<sup>e</sup> siècle) 開拓了一個收獲極豐富的研究方向，啟發了幾位史學家在這方面的探討：如米修·渥威里 (Michel Vovelle) 的「巴洛克時期的虔誠與脫離基督教——泊洛方斯 (Provence) 地區在啓蒙時期對死亡的態度」、菲力浦·阿里斯 (Philippe Ariès) 的「面對死亡的人」

、坡埃·樞奴 (Pierre Chaunu) 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在巴黎之死亡」等等。

費夫爾去世後，幾位史學家沿着他的方向從事新的心態歷史並決定其意義，其中包括胡殊·杜比、荷卑爾·芒德魯 (Robert Mandrou)、傑克·萊·哥夫、阿里斯在本書中解釋了心態歷史在近期的新歷史中的重要性（譯註三）。在這裏，我只是再略提一下「心態」這個詞像許多其他模糊的概念一樣，是曖昧的、朦朧的、有時甚至會令人不安，但是在最近的史學發展中却扮演了最積極的推動角色，特別是在這個需要的時候，平衡了經濟史。心態的研究為歷史帶來了新氣息。

#### 四、量化歷史與資料革命

經濟史學家很早便開始經營數字與統計資料。但最近廿多年來，幾乎所有與數字打交道的史學家的眼睛都轉向計算機，一場革命因此爆發：量化歷史。萊·華·拉杜里曾故意誇張地說過從今之後史學家除非懂得操作計算機，否則不堪稱為史學家。

#### □ 對所有人的關切

的確，這場革命起自量化歷史之擴張至所有可以計算的東西，尤其是人口歷史及文化史。家庭、兵役、文學產品的資料都可以紀錄在打孔卡上輸入計算機。這方面的先鋒包括夫雷與樞奴，後者更是「連系數字所構成的歷史」(histoire sérielle) 的「創作人」，所謂「連系數字所構成的歷史」就是以連串物價數字所構成的經濟史為藍本，把在特定的一段時間內一切可以計算的事物築成一系一系的連續字。量化史學大師以可靠牢固的資料所寫成的創新的、基本的優秀著作不但說明了量

#### (2) 歷史與今天 (le temps présent)

雖然費夫爾是「十六世紀」的專家，而保洛克是中古史學家，但兩人都着迷於今天。保洛克認為我們必須有膽識把歷史的領域延伸「至對今天的認識」。同是在早期的《經濟與社會年鑑學報》裏當代史的文章佔相當重要的份量。然而新歷史最主要的躍進是產生於中古史及近代史的研究領域之中。不過，當然，其中仍有很特出的例外，有些是個人的，有些是集體的成就：在上古史方面，困難固然很多——緊連着正統人文學科和經營學問 (érudition) 的傳統歷史包袱十分沉重，同時儘管得到考古學的從旁協助，上古人類的日常生活資料少如鳳毛

根的歷史的孤兒這個夢魘，他們狂熱地在尋找自己的認同；到處都是在計算在維護他們認為是祖國領土的人；都是為過去，為現在不斷堆積資料的人，人無不忙亂地在嘗試掌握一個不可捉摸的歷史底法門。在這種情形之下，甚麼能比新歷史更有效地為這些人提供資料和答案呢？新歷史能包容人的一切並把他放在一個以世紀計算的時間內，以永恒與轉變來照明他，讓他物質與精神的因素中，經濟和心態的因素中找到平衡。新歷史向他提供選擇而不是抉擇強加于他。人一向要求歷史扮演一個最廣義的重要的社會角色，今天，在這個角色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來得重要之時，如果具備有新的研究與教學（各教育程度上的）方法和目前亟需的普及媒介，新歷史當能駕馭就輕地擔當這個任務。

#### (3) 新歷史與馬克斯主義

面對馬克斯主義時，新歷史所代表的整體更新始遭遇遇到最根本的問題。這不是說兩者中間有某種不可妥協的東西。而是當史學家公開地承認啟發來自馬克斯主義時，雖然他們所作的歷史在抵抗實證主義史學的意識形態，他們仍得採用其方法。新歷史是在這種很特殊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因此我們不得不釐清一下新歷史與馬克斯主義之間的關係。在本書中坡埃·維拉 (Pierre Vilar) 分別論及馬克斯與國家 (Nation)，說明了我們可以同時是馬克斯和費夫爾的信徒。近期多種著作亦向我們分析了馬克斯主義史學家在這方面的轉變。在這裏，我只略為提一下馬克斯主義與新歷史之間的重要匯同及可能的分歧。

更重要的事，新歷史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幾個重要疑問至少提供了一些解答。早在一九四六年，費夫爾便肯定地說：「我們要作歷史嗎？不錯，只要歷史是唯一能在這個經常不穩定的世界中讓我們能用恐懼以外的反應來生活下去……」可是我們更準確地說：「只要新歷史是最能夠……」因為在我們今日的世界裏，集體記憶在變，平凡的人無不希望逃避變為無

#### □ 為時代的疑問提供答案

的歷史是問題性的 (problématique)，是綜合各學科的知識的 (interdisciplinaire)，是處於長久持續時間內的，同時是整體歷史的嘗試。馬克斯及馬克斯主義之分期法 (從奴隸制到封建制再到資本主義) 雖然不能以這個形式被接受，但不失為一個長久持續時間的理論。雖然他提出的下層建築上層建築等想法似乎不能闡明不同層次的歷史真實之間的關係的複雜性，但不可否認，這些想法都訴諸「結構」這個概念，這正是新歷史的一個主要趨向。馬克斯主義把羣衆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放在首位與新歷史之對日常的、身在社會中的人的關心亦有相通之處。然而，在許多基本的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出新歷史對官方的馬克斯主義歷史是一種挑戰：經濟為馬克斯主義解釋歷史的至高因素，而新歷史的大方向是處理上層建築中之心態 (mentalités)，因此儘管心態並不佔有基本的因果性 (causalité) 的位置，却是新歷史之中心研究；最主要的分別還是三個是直線的歷史，而發展的模式只有一種，而另一個却強調了歷史經驗之多種分別與不同處理方式 (approches) 的必要。新史學家——馬克斯主義的也好，非馬克斯主義的也的——都應對這種對立作更深入的反省與探討。這是今日的歷史的任務之一。

(2) 「年鑑派」的傳統與新一代的史學家  
我想我不需要在此再贅述新歷史的成長大部份是圍繞在『年鑑學報』的編輯部周圍的。不過，無論以前或今天，有一部份傑出的史學家並不會與『年鑑學報』有任何聯繫，有些甚至對學報並不同情，但這並不減低他們在新歷史中的重要地位。我特別聯想到的是路易·雪伐里埃 (Louis Chevalier) 及他的著作：『十九世紀前半期巴黎之勞工階級及危險階級』。他這

事件 (événement) 的研究在其新的基礎上已逐漸獲得平反。心態歷史與研究意識形態 (représentations) (譯註四) 的歷史『在『年鑑學報』早期只是一片模糊的形象，今日已成為主要的推動力。而量化歷史在另一方面則無疑是一件嶄新的事物。

## 六、新歷史的任務

我認為，新歷史將來有三個可能的和應該的發展途徑..

(1) 推進新的學問經營 (érudition)  
傳統史學的方法及技巧建立了牢固的基礎及傳給後世一個仍然可貴的遺產。新歷史革新了歷史的問題 (problèmes)，但在經營學問方面，並不會有同樣的技巧創新。這件任務主要包括下列三點：

甲、應建立對文獻資料的新觀念和對資料的新批評。資料文獻並不是中立的、清白的，亦不是隨着史學家的抉擇而變色那麼簡單，而是部份地由其時地來決定其性質。文獻是過去的社會有意識或無意識產物，一方面把一個形像強加於這段歷史之上，另一方面却為「真實」提供了線索。傳統批評的針對「不實的」 (faux) 的文獻 (保洛克在他的『歷史底辯』中亦不能超越這一點) 已是十分不夠的了。我們應把資料文獻的結構拆開以便揭露其產生的條件。究竟甚麼掌握了了一個過去的社會本身所產生的見證——即有意或無意地成為歷史之文獻的東西？我們應從米修·福口 (Michel Foucault) 在他的『知識的考古』 (archéologie du savoir) 中提出的文獻文物的 (document/monument) 概念開始探討 (譯註五)。同時我們亦應將歷史中的空洞 (lacune) 和沈默部份規劃出來並嘗試作解釋。

本代表作透過歷史與人口學之結合更新了社會結構的歷史及新歷史視野內之社會史。

不過，我覺得釐清當代新歷史的情況是必要的，儘管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和在這裡我沒法作較深入的探討。我們應該把今日的史學與費夫爾在他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歷史的奮鬥』的序言之中向當時年青的史學家要求的一樣。

□特惠的對談者：人類學

新歷史已贏得了多次的勝利。經濟史、社會史已佔有基地而變為基本研究。研究方法、小組歷史研究的實踐不斷在發展。同時新歷史把向其他人文科學開放視為今日最主要的任务，雖然其中困難重重，甚至還有許多頗教人失望的地方。很多史學家都了解我們必須保持新的目光，不斷找尋新問題、新園地，讓歷史研究永遠跑在前端。以問題 (problèmes) 作為推動力，透過國際合作而實現的整體歷史仍然是要努力爭取的目標。

不過『年鑑學報』最早期推行的經濟史社會史已不再是新歷史的先鋒。人類學——這個在學報早期扮演無關痛癢的角色的科學——剛與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相反，已變為今日新歷史最特惠的對談者。對政治史的恐懼已再不是信仰，因為政治這個概念已變，同時關於權力 (pouvoir) 的問題 (problématique) 已成為新歷史必須探討的課題 (著者案：請參看 "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 in *Historical Studies & Today* ed. F. Gilbert & St. R. Graubard, 1972 )。同樣地，如黑爾所指出的 (著者案：請參看 P. Nora, "Le retour de l'événement" in *Futur de l'histoire*, 1974)。請

我們不但要把握歷史倖存至今的充滿實在的部份，還要捕捉那些空白的部份。

乙、應重新處理歷史的原料——時間——的觀念。同樣地我們要探討究竟什麼東西掌握了時間及其量度標準與用法。我們必須打破時間是唯一的、統一的、直線的這個觀念。而建立歷史社會是有不同性質的時間的靈活觀念。阿爾拔瓦克斯 (Halbwachs) 跟胡爾殊·古爾維茨 (Georges Gurvitch) 所定義的社會性的時間 (temps sociaux) (著者案：請參閱阿爾拔瓦克的『記憶的社會架構』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1925) 與古爾維茨的『社會事件時間的多元性』 (*la multiplicité des temps sociaux*, 1958) 的多元性可作為模式)。同時，我們還必須重建一個新的科學性的時間，以歷史現象在歷史中最活躍的時期而不是其產生年代為分期的標準。無論是物質性或精神神性現象皆應如此處理。我們已有能源的時序 (先是人為動力然後是畜為動力、蒸汽動力、電力等等)，我們亦應有信念的時序 (煉獄在十二世紀末的基督教社會中誕生，到了第二次梵蒂岡會議 [Concile de Vatican II] (譯註六) 時已完全消失)。

丙、應該調整有意義的比較方法，讓史學家只比較可以互相較的事物。在封建制度方面，我們應避免太廣闊的定義，因為在同一項大帽之下會走進太多在時空中相差太遠的，又並非源自可比較的歷史系統的現實世界 (réalités)。例如所謂非洲的封建制度上與歐洲九至十世紀的封建制大異其趣 (而歐洲本身各期的封建制就各有不同之處了)。不過，我們亦不能把這個概念縮得太狹窄，因為這樣會排除像比較歐洲與日本封

建制度的可能性。

### 二、往 整體歷史和假想 (L'imaginaire) 的研究方向發展

首要的工作是參考以前社會所遺留下來的所有的文獻資料：文學性的、藝術性的資料尤應結合其本身的解釋分析而被採用，同時還要闡明這類材料及促使它們產生的各種人性意圖的獨特性。我要說的是歷史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層面——假想的研究——至今仍十分貧乏。多種的歷史性的真實纏繞著這個夢幻的部份，若這個部份能從這些複雜的關係中解脫出來，我們將步進社會心臟的深處之中。在這方面，史學家應與在杜航 (Durand) 領導下的「尚比利 (Chambéry) 假想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imaginaire) 講求更密切的關係。杜航本人就來自文學史及語言學界。

要做到這一點，史學家選擇的研究主題是我與杜卑爾 (Toubert) 所稱的概括性結構 (structures globalisantes)。我們已經提出過 incastellamento 的現象，即十一世紀所建設的農村居住環境，還有對工作的概念、戰爭、農村的荒廢、社會的邊際現象 (marginalité) 等等。

#### (1) 關注觀念及理論

費夫爾在一九三三年法蘭西學院的就任典禮中說：「人不斷地在觀念 (idées) 及理論 (théories) 上動腦筋。關注觀念因為科學的進步不外是靠思想的創造性及創新的力量的推動；關注理論因為我們大概都知道理論不能完全包容自然現象無限的複雜性。不過，在科學 (La Science) 要擴大人的思想領域這個無窮的欲望」，觀念及理論不失為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刻上的「一個緊接一個的路標……。」

## 七、歷史之前途

直至今天，新歷史努力地要逃避兩個威脅：一是太系統化 (systématisé)，一是如實證學派那樣過於注重經驗 (實證學派因為沒有理論而以客觀自居，其實往往只是缺乏觀念 [idées] )。但是我們得承認，雖然費夫爾作過這麼的一個宣言，但是新歷史學家在很合理地堅持處理方式 (approches) 的多樣性之餘，仍舊忘却對理論的關注。講理絕非教條化，只是讓史學家或任何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在他們的工作後面必然持有的理論得到表白。他應該認真地、有意識地思索這一點並把結果公諸於世。我特別希望史學家就算逃過了僵硬的歷史解釋系統，不要否認歷史系統的存在。他的責任就是要分析這些系統的結構與轉化。

最後，我們可以問歷史在最近的或較遠的將來會遭遇到何種的轉變。保洛克就會經想過這個問題：「所以只有一種把人放進時間內的科學，不斷地需要結連著對已死去的人的研究與對活着的人的研究。這個科學稱作甚麼？……我覺得歷史這個古老的名稱顯得最明顯、最沒有限制性，同時充滿了一個悠久的奮鬥所帶來的令人感動的回憶。」

我們不是先知不是占卜者，但我們可預測三個假設：

——或則歷史繼續向其他人文科學投資，儘量吸收它們而變成一個泛歷史 (pan-histoire)，一個人的整體科學，把人處於時間之中。

——或則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三個最接近的社會科學溶化一混合體。保羅·維恩 (Paul Veyne) 把這個可能的新科

學稱為「社會學性質的歷史」 (histoire sociologique)，我則認為「歷史性人類學」 (anthropologie historique) 一詞更為恰當。

——或則歷史中止其界限的開放，再不與其他人的科學眉目傳情，而在一個新的領域上，透過一個「認識上的突破」 (coupure épistémologique) 找到自己的樂土。我想米修·渥威里在本書中很積極沿着「短時期與長時期的一個新的辨證」這個方向探討這個突破。

無論怎樣，我們應該期望的是歷史科學從今之後可以更容易地逃過歷史哲學的誘惑，拒絕把歷史看作是抽象的精靈的歷史 (譯註七)，而從人所經歷過的歷史那裏找到更理想的定義。史學史 (l'histoire de l'histoire) 非常有意義的發展應繼續下去，歷史會因而得解。

### 點 誌

譯註一：杜氏社與「社會史與社會想像形態」 («histoire sociale et idéologies des sociétés») in *Faire de l'histoire*, Vol. 1.

Paris: Gallimard, 1974, p. 149) 文中提及所謂「意識形態」、「歷史學家應該去這個謂今日所沾有的特別的含貶意的政治色彩」，他同意路易·呂都塞 (Louis Althusser) 為這個謂所下定義：「是一個存在的和在某個特定的社會中有其歷史性角色的顯像 (représentations) (影像 images, 神話 mythes, 觀念 idées 或概念 concepts 等，視情形而定) 系統 (systèmes) (有其獨特的邏輯及嚴謹性)。」這裏很勉強地翻譯為「顯像系統」的其實即上述定義下的「意識形態」。

譯註二：即所有鞏固理性思考方式的感性的 (感覺 perceptions)、聽覺的 (詞與句法) 和概念的因素。參看本書第四四八頁。

### 食貨月刊合訂本 第十一卷

售價，各卷定價一律五〇〇元，情非得已，  
諸希鑒諒。

合訂本第一卷至十一卷尚有少量存書，  
歡迎洽購。

本刊讀者八折

月刊零本每期二十五元，恕不折扣。

請利用郵政劃撥一六九三七號食貨出版社社